

評諸橋轍次著大漢和辭典

梁 容 若

日本漢學家諸橋轍次博士，以四十年的努力，編成煌煌十三鉅冊的大漢和辭典，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全部出齊，我國很快就有翻印本。日本除初版外，並有一九六四年的新版。在公私圖書館乃至學人的書齋裏，已經成爲常見的工具書。查典故的人們，常常說：「大漢和收了沒有？」「大漢和如何如何」，中國重印本的廣告至於說：「選材最嚴謹，編排最新穎，單字最豐富，語彙最完備，注音最清楚，解釋最精博，引典最正確，插圖最明晰，書目最詳盡，索檢最便利」，舉出十大優點，以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認爲「大漢和辭典問世，有助於中日及東西各國學者，對漢民族文化的加深瞭解。凡欲增益本身學識，提高國文成績的，不可不備」。可見他的需要和聲譽了。本篇想把本書的編者、體例、各種批評、作較詳細的介紹，也把我個人翻檢本書所得的觀感，記出一部分，以就正於編者和國內外的學術界。

一 諸橋轍次博士的生平

諸橋轍次先生號止軒，明治十六年（清光緒九年西元一八八三）六月四日，生於日本新瀉縣。五歲讀三字經，七歲入尋常小學。二十二歲畢業於新瀉第一師範，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國語漢文科。二十八歲畢業於高師研究科。民國八年奉派赴中國留學，時年三十七。民國十年八月歸國。年四十四，任東京高師漢文科主任。民國十八年授文學博士，年四十七，其論文爲「儒學之目的與宋儒慶曆至慶元百六十年間之活動」（東京大修館書店出版）。氏曾久任東京文理科大學教授，兼任東京帝國大學講師，又曾兼任東京文理科大學圖書館長，岩崎氏靜嘉堂文庫館長。五十四歲時，曾爲日本昭和天皇進講，七十歲時（一九五三）爲皇太子明仁進講。其他著書有「中國之家族制」（昭和十五年大修館書店出版），經學史（與安井小太郎合著，昭和八年東京松雪堂書店出版），經學研究序說（昭和八年東京關書院出版）。退休以後，東京文理科大學聘爲名譽教授，主要精力用於完成大漢和辭典的編輯。他在大漢和辭典的卷後跋文說：

說起來，立身在教育界，過了五十年。公務以外，差不多大半精力傾注在這部書。既沒有天賦的才能，健康也不行。在我說，這已經是用盡力氣的成績了。餘生僅有的力量，要從事於此書的補訂。假使幸而後世有志學者有修訂這書的機緣，上學幾項或可以供幾分參考吧！回想在父親的膝下，五歲讀三字經，七歲讀四書，到現在（一九五九）整整七十年。學了漢學，傳了漢學，又編了漢和辭典，成就本來沒有可以向人說的，只是守得庭訓的一部，感到心靈的滿足。把這書恭敬地供到先考先妣的靈前。這種謙遜質樸的文字，充滿了孝敬傳家的儒者風度。他七十歲的時候，門弟子和朋友們

爲合編有諸橋博士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十月由東京大修館書店出版。

二 大漢和辭典編印經過

諸橋轍次從民國八年留學中國時起，就意識到漢和辭典一類書的重要。以後作了種種準備工作。民國十六年東京大修館的鈴木一平氏請他編漢和辭典，最初計劃只是一兩本厚的普通辭典。到民國二十年，卡片作到三四十萬張，選擇困難，拋棄可惜，就和書店商量，擴大範圍，向包羅萬象的大辭典邁進。和他合編的前後有九十人，列名在十二卷末。初期蒐集資料，大部分是大東文化學院方面的人員，後期整理資料，主要是東京高等師範東京文理科大學東京教育大學的關係人員，都是當作業餘工作的。幫助他最久，貢獻較多的是川又武、渡部實一、眞下保爾、佐佐木新二郎、原田種成、近藤正治、小林信明、渡邊末吾、鎌田正君、木山寅太郎等人。前東京女子大學教授近藤正治，協同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出書前三個月去世。書在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完成，九月印行第一卷。諸橋並且因此接受過朝日新聞的文化獎。到三十四年二月的東京大空襲，大修館書店全部焚毀，已排成的鉛版資料等一起化爲灰燼。到世界戰爭結束，大修館以印行英語辭書英語會話書及教科書業務復興。諸橋也尊重原契約，收拾僅免於戰火的校樣，繼續細心修訂。到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才又公告，開始印刷，每年出三冊，到四十九年全部出齊。索引一冊也在五月後印出。離戰前出第一卷，過了十六年，離書店最初訂編輯契約過了三十二年，離最初作原典索引基礎工作，過了三十七年，諸橋已是七十八歲的老人了。全書爲十六開本，共十三冊，本文十二冊，索引一冊，頁數爲一四八七二，收漢字單字四萬九千七百，收語彙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插圖約二千八百，本文總字數爲四千三百萬言，單字數較康熙字典約多二千字，語彙較佩文韻府約多十萬語，定價上製本爲日幣六萬五千元，特製本爲日幣七萬八千元（一九六四年全卷出版完結紀念預約價）。臺北文星書局四十九年的景印本，定價爲新台幣二千六百元。

三 編輯方針與體例

辭典編輯由諸橋一人負總責任，文字語彙的選擇，解釋的體裁，都有統一的計劃，與多數人共同編的類書不同。從專門方面看，採擇古今典籍中的重要文字語彙成語，從許多角度上作根本的檢討，加以適當解釋，並詳載出處用例，發揮了作爲學術研究書的文化性。從實用方面看，基於調查現代通用必要的文字語彙、成語的慣用程度，儘量網羅，解釋力求平易，努力於保持作爲日常文化生活指南書的普遍性。內容體例如下：

1. 字形：以康熙字典爲根據，參考說文、爾雅、玉篇、字彙、正字通等書，作統一的決定。揭示篆書，慎重究明六書的本義。屬於象形指事會意的三種字，解說構造，以闡明原義。各種引申義的產生路徑，亦加說明。字形類似易誤的字，在「參考」項標明，加以字形字義說明，以辨差異。

2. 字義：解釋以平易確切爲主，明標出處，舉應用實例，並究明音義通用文字的相互關係。同一文字有別體俗體者亦加列舉。中國現代語，佛教語，日本特有解釋，選入最普通者。日本人名之特殊讀法於「名乘」項列舉。本文解釋不足，有疑義處，以參考補足。異體同字（如鷄雞之類）者，在一字下詳說，另一字記與某字同字，以避重複。基於字音的字義區別，

以記號分別。異音同義時併記。義訓之排列，以本義爲先，逐次及於引申義。同一訓詁而內容小異之時，加以記號細說。

3. 字音發音以反切法爲本，以集韻、廣韻爲中心，參考各種韻書字書，嚴密記明出處，區別古來使用的漢音唐音。分韻據韻府群玉、佩文韻府，依近世通行的一百零六韻。漢音吳音之外，從來慣用的音，選其穩妥者，揭於漢音吳音之後。文字中一般通行的中國現代音，特別用注音符號標出，并附記威特式拼音，以期發音正確。

4. 關於語彙成語的解釋，力求平易適切。先說字義，次及轉用義，更舉同義語、類似語，關係語，以助理解。每一解釋均舉根據出處及用例，例句詳記書名篇名項目題名。讀法用片假名標出，有兩種以上讀法時，一併記入，爲區別不同意義，讀法不同時，均一一記明，以免誤解。中國現代語均用威特式羅馬字標明發音。說明困難之複雜事項，用圖表輔助，務期能一目瞭然。

本書除網羅我國古今字書所收字外，並收入古文異體字，現今通用俗字簡體字，日本所造漢字。

語彙成語除我國典籍所有外，並涉及韓國日本漢學語佛典語，乃至俗語隱語等。人名地名書名帝諡年號等，全部採入。

篆字據說文解字、說文通訓定聲，說文長箋，六書分類，說文解字段注，分別古文、籀文、小篆、或體選定照像。篆文總數約收一萬零一百字。

插圖由三禮圖、禮記圖、名物圖、金石索、西清古鑑、三古圖、古今圖書集成圖錄、大清會典圖、三才圖會、和漢三才圖會等數十種書中選出，總數約收二千八百幅。

各卷封皮內均附有部首索引，第十三卷另有筆劃檢字索引，四角號碼索引，日文字音索引、字訓索引。不論使用其中任何一種檢查法，均可應用。

本書每一單字語彙，均各按排列順序編號，各卷頁數及全書總頁數，亦均分別詳細注明。凡檢查一單字或語彙時，其有關而須對照的單字或語彙，均附注卷數與編號，查閱時較爲便捷（註二）。

四 日本各方面對辭典的評價

本書在戰前即一九四三年出第一卷的時候，朝日新聞社即曾授以朝日文化獎，由當時的文部大臣主持，爲召開出版慶祝會。宣傳爲「真正世界第一」的漢語辭典。一九五五年再度發刊的時候，有日本各方面的權威學者文化人二十位，爲寫了二十篇介紹文章，只看題目就可以知道他的內容。鈴木虎雄稱爲「開東洋文化寶庫的鑰匙」，新關良三稱爲「運輸東洋文化的車與船」，宇野哲人說「偉大的業績，康熙字典可廢」，金田一京助稱爲「漢字典界曠古之偉業」，金森德次郎稱爲「完備唯一的近代漢字辭典」，鹽谷溫稱爲「應當由國家經營的興亞大辭典」，土岐善磨稱爲「壯大無比的業績」，山岸德平稱爲「不崩壞的最高峯」，山田孝雄稱爲「漢學進運的大貢獻」，西尾實稱爲「學界待望的大慶事」，小泉信三稱爲「日本人所建的一座紀念碑」。全部出版以後，在發行二次預約的時候，又有十九位學人作家爲寫文章推薦，這包括了更多方面的觀察和啓示。神田喜一郎博士說：「中國講不朽之盛事，經國之大業，諸橋博士的大漢和辭典當之而無愧吧。我敢說這是日本有文獻以來的最大鴻業。近年來關於國語問題，一般有輕視漢字的風氣，可是在我國漢字的重要性，却不因爲教育政

策有什麼影響。東洋的至寶，中國日本的古典都是用漢字寫的，永遠不會失去生命。網羅漢字的一切知識的是大漢和辭典。」作過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鈴木大拙博士說：「這樣的書出來，可以綜合地檢查中國文化特性，真是可以感謝的事……這樣的字典，有什麼機會，翻成歐洲各國的文字，對於東西文化理解，會有大貢獻。」……日本標準羅馬字學會的常務理事宮崎靜二是以提倡日本文字羅馬字拼音化知名的，對於本書說了以下的話：「提到辭典，馬上想起牛津大辭典，這是世界的名著，永遠不滅的，大漢和辭典是有過之無不及的文化產物，這種產物是文化的偉業，使我感到民族的驕傲……牛津辭典是由幾十位碩學合編的，大漢和辭典是諸橋君獨自負責成書的。牛津辭典是由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出版部印行的，大漢和辭典是一個書店獨立出版的，兩相對照，不是可以誇示於世界的民族文化嗎？關於漢字，超過這書以上的書，將來也許永遠不能產生了吧，我這樣想着，也為民族祝福。日本民族要放棄了在世界舞臺第一線上爭勝敗的雄心，就有走上滅亡之途的恐怖。因而狂熱於使國民科學向上的工具羅馬字的國民普及化。同時也相信尊重親近民族的傳統，可以使民族的心靈氣味提高。因而日本民族生活如有餘裕，永遠會親近漢文學，也會愛古事記萬葉集等古典，因而也希望有依原文欣賞古典人的存在。」東洋史學者有高巖博士說：「本書是現今最大的中國歷史文學事典。關於日本的項目，如六國史、懷風藻、文華秀麗集以下，各時代漢學者的詩文集也一一列舉。日本漢文學史的內容，關係國學的如紫式部、清少納言、本居宣長等人和他們的著書，群書類從等也都涉及……大漢和辭典，公私立大學圖書館不必說，高等學校中學也一定要預備一部。測定一個國家的文明，看辭典類整備程度如何，判斷一個圖書館的研究設備，也看有無萬人必讀，便利正確的辭典。說到個人藏書，如本書也是可以傳之子孫，更放光輝的著作吧！」京都大學的吉川幸次郎博士說：「日本人放鬆了讀中國書，不到一百年，由於自己過去和現在的意識修正，也許有再恢復讀中國書熱情的傾向吧。這時候最需要的是好的辭書，諸橋先生的辭書的存在，在這意義上真感佩無量。不但有國內的意義，也有世界的意義。世界上收這樣多的漢字漢語的辭書，現在更沒有。中國作過這種企圖的中山大辭典，只出了一個“一”字一部分就停頓了。美國哈佛大學的企圖，也只作了“子”部分就停頓了。」和歌作家木俣修的「讀偉大的大漢和辭典」說：「想以文學立身的人，先要把最好的辭書放在身邊，查辭書是不要偷懶的。這是一代詩宗北原白秋常常嚴正指出的。白秋寫作用的房間的書架上像是要證明了他的話，燦然擺滿了國內外有權威的龐大辭典。白秋又說過，辭典不只是要查，辭書也是讀物，好的辭書是最高的讀物。展開大的辭書，這裏那裏讀的姿態，還像可以看見。這個驅使無比的豐富辭彙的詩人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裏。我對於這三十年前的教訓是不會忘記的。年輕的時候，還不像這樣認真，年歲越大，越感到讀辭書的興趣。諸橋先生的大漢和辭典出齊了，我像是有了萬卷藏書的喜悅。一輩子也讀不完的讀物，常常放在身邊，這種心靈的豐裕，真是說不出的陶醉，說不出的幸福事了。」九州大學的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會員春日政治博士的文章說：「近來國語研究的一個分野，訓點學興起來。古來國人使用的漢字音訓不必說，從漢文接受的語彙、語法、文脈等的具體的史料探尋盛行。我相信這種研究對於我國漢字學有相當用處，我也是在這方面感到興味的。諸橋博士的綜合辭典。對於這種研究，給與如何大的方便，對於訓點學的體系化，給與多少豐富的暗示，這是我先要對於本書表示感謝的。」大東文化大學高田眞治博士說：「清儒說，講經學爲了明道，要從文字語言開始。諸橋博士是明經之士，是講大學之道的老師，能完成這種文字學的大著，確

示大學之道的基礎，與後學以無量便利。近三百年來，入於東西文明交流融會的時代。不可以爲西洋文明所壓倒，忘記東洋傳統的優點，演自暴自棄之愚。本書的企畫具有深意，可以窺見，朝野都應當予以大力支援，以成其美。」日本大學高木市之助博士稱爲「支持東洋文化的著作」。全日本中學校校長會長牛山榮治謂爲「全國學校必備之書」，俳諧人作家加藤秋郎的文題是「讚歎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強韌不撓之力」。文藝春秋社社長佐佐木茂索則對於大修館書店鈴木一平社長因出版本書得菊池寬獎發表意見說：「我也是出版業的一人，對於鈴木社長決意刊行辭典的勇氣，只有敬佩。……出版是營利事業，辭書如果只顧營利，大到字源那樣的書就到極限了。越是淺近的越是有利的書，是一般常識。在漢字制限時代，甚至可以說是衰亡期，敢於冒險，如此成功，是命吧，是運吧，拿到手的人都有益處，把善良有用的典籍留給後人，真感到鈴木社長在出版上有一代男兒的真價。菊池寬文學獎給予有數的出版事業中的大修館諸橋大漢和辭典出版的苦心，是極其應該的。」前文部大臣天野貞祐博士則強調本書的出版，表現了道德精勤，他說：「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當時我正任京都大學教授，在文學部教官室看到大漢和辭典的第一冊，震驚於規模的宏大，想到完成的不易，和同事們談到，擔心日本的前途，能使這事業完成嗎？對於祖國的不安，雖不幸成爲事實，萬難不屈，今日終於看見大漢和辭典的完成，這種道德的精勤，是無論如何讚歎不夠的。少年時代讀內村鑑三先生著的給後世的最大遺物，強烈感動於加萊爾（Carlyle Thomas）道德的精勤。他榨出生命的血來寫作。他的法國革命史的原稿被友人借人，這家的下女，錯把它當作引火物放在爐子裏燒了，一時陷於絕望的加萊爾，鼓起勇氣來，重新寫出。加萊爾的偉大，不是在革命史這本書，是在火燒了再寫這種精神。內村先生是這樣說的。大漢和辭典對於學術文化的發展有大貢獻，同時他的完成的歷史，表現了道德的精勤，這對於後來的世道人心，但願能有大的道德影響。」

著者諸橋轍次博士在二次發售預約的廣告上，有以下的說明：「社會上關於漢字漢語雖然有種種議論，無論世上的潮流如何，我堅定相信，除了這種研究以外，無法宣揚東洋文化。應該作的作了，應該盡心的盡了，就作成的結果看，只想出些不滿意的地方，有時實在感到慚愧的心情也有。這些在十二卷卷末跋文裏也說過了。如果能夠，想在某時期改訂。人間事總是受限制的，不一定都如人意。生來天資不高，健康也不好，這已經是用盡力氣的成績了。雖說殘生要用於補修，不足的部分只有等待後世學者的補正了。」（註三）著者是這樣地虛懷若谷，讀本書的人們，隨時記出所見到的問題，所發現的偶然疏失，供給修訂本書的參考，也許是編者和各方面所期待的事吧！

五 對於大辭典的意見

①本書各條解釋末附參考文獻，使檢查者可以作進一步的研討，是很好的體例，比我國的辭源辭海可以說進了一步。但是有些參考文獻不是查原書來的，是隨便想出，全無根據的，那就不但無益，反而有害，也妨害辭典的學術性了。例如第十一冊第九六二頁隨園詩話條下注（四庫提要別集類存目）查四庫全書修成上表在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四庫總目爲修書之副產物，袁枚卒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袁氏的著作既不曾著錄於四庫，也沒有一部在存目（註四）。詩話如果著錄，一定在詩文評，也不會在別集類，把詩話列入別集，可使讀者對四庫書目的分類也造成錯誤觀念。

②又如第三冊第八十頁說：

國史考異，書名，六卷，選（撰之誤）者未詳，參證實錄野史及諸家文集碑志之異同（四庫提要史評類）

這又是無中生有的事。四庫提要的史評類不必說，整個的四庫史部著錄的存目的，連阮元的未收書目，清代的禁書總目裏都沒有這部書。編者從何處聯想錯鈔出來，都無法猜測。從他所記的書名卷數內容看，所說的一定是清初吳江人潘耒章（力田）吳炎（赤溟）二人合著的國史考異。這書探討明初太祖到惠帝成祖三朝史事的不同記述。吳潘因為牽涉到莊廷鑑的史案，在康熙癸卯（西元一六六三）被殺，稿本由家人秘藏，到清末潘祖蔭始刻入功順堂叢書，已經為治明史的人所注意，後來商務印書館印入叢書集成中，流傳更廣。近年臺北藝文印書館附錄於藝文本的明史後邊，一般人更容易看到了。潘耒有國史考異序，見遂初堂集，顧炎武有書吳潘二子事，神州國光社印出吳赤溟集，秋室集記有驚隱詩社和莊廷鑑史案始末（註五），根據這些資料國史考異的書和作者，都可以詳細知道。辭典所說，迷離恍惚，又附以無根據的參考書，可以說粗疏到可驚了。（臺北刊四十一冊的中文大辭典第七冊第二三八頁國史考異條，已經發現國史考異作者為潘耒章，但仍承襲了大漢和辭典「見四庫提要史評類」的錯誤。

③第一冊第六頁凡例云：「新論＝劉勰新論」。第二卷第一四零五頁劉子下注云：「十卷，一名新論，撰著未詳，或云劉歆，或云劉勰，或云劉孝標作，唐志始著錄。」以下全鈔劉子五十篇目錄。又查第五卷第五二八二頁新論下注云：「十九卷，撰者未詳，見二卷劉子項。查劉子是北齊渤海人劉晝所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已經這樣著錄。四庫提要雖然存疑，也仍然列出劉晝的名字。余家錫的劉子辯證出來，列舉四證，以為確實出於劉晝（見余著四庫提要辯證子部四，民國二十六年北平排印本，一九五四年版收入卷十子四，本條無甚變動）（註六），這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定論了。辭典竟採用最不可靠的舊傳說，甚至於嫁名到劉歆、劉孝標，未免疏於別擇。又近人楊明照作劉子理惑，謂是書稱名，以署劉子者為當，題新論者始於明程榮印漢魏叢書，來源非古。

④第一冊第四一五頁坐事條，引先哲叢談物徂徠，「父方菴，延寶中坐事竄上總。」又引重野成齋佐久間象山碑：「尋遷長沼城，坐事國除。」物徂徠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間人，重野成齋是清末人，如何可以當作語原引用？蘇軾初到惠州詩：「夷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史記英布傳：「有客相之日，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漢書賈誼傳：「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坐作「因為」或「科罪」講，類似的用法，早見於中國不少古書了（註七）。

⑤第三冊第五四頁太和正音譜下注云：「此書中國亡佚，獨日本舊昌平校學問所藏之，今在國會圖書館。」這是不正確的說法，王國維曲錄云：「太和正音譜二卷，明寧獻王權撰，四庫全書提要之涵虛子詞品一卷，即此書上卷。蓋提要所著錄者，即曹溶學海類編一本而曹本又出於元曲選卷首所錄、蓋取譜中卷首論曲之語別為一書也。然此譜全帙實具載明程明善嘯餘譜中、今以李玉北詞廣正譜所引正音譜數十條，校之嘯餘北曲譜無乎不合、知嘯餘北曲譜之十卷及卷首即鈔取獻王全書無疑矣。錢唐丁氏善本書室有影鈔洪武（三十一年）刊本。」可見此書在中國未曾亡佚。又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註八）詞曲類有太和正音譜三卷六冊，註明刊，原係豐後佐伯藩主毛利高標本，可見在日本也不獨舊昌平校學問所有。

⑥第七冊第八八六頁王念孫條下云：「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九十。」本條以十一

行記清代大漢學家王念孫，大體正確得要領。很像是編者自己執筆。參考書日列有續碑傳集卷七十二，那麼一定看過徐士芬所作原任直隸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這事略明記王念孫死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道光五年乙酉，他還參與過北京的鹿鳴宴，就是他中學人的六十年慶祝，（他是乾隆三十年乙酉舉人）如何可以教他提早三十一年死呢？王念孫這樣名人，自己有年譜，父親安國，兒子引之，都有詳細傳記資料，他在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序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更是弄文字學的人容易有的印象。這種突然出現的錯誤，實在不容易想出道理來。（嘉慶六年不是他罷官的年，也不是他父親的卒年。）

⑦第十二册第三三一頁風月堂詩話條下云：「宋朱弁撰，此編多記元祐中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梅堯臣及諸晁遺事，其窺見深處，後之論詩者，皆所未及。」查元祐是宋哲宗年號，從一〇八七年到一〇九三年。梅堯臣卒於仁宗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歐陽修卒於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元祐中如何能有梅堯臣歐陽修的故事，這種錯誤是承自紀昀的四庫提要，還可以原諒。提要說：「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尤為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提要所推許的只是朱弁論黃庭堅詩的一點，辭典的撮要簡化，却不知不覺中把論旨擴大到詩論全部，朱弁居然成了南宋以後的最大詩論家了。提要鉤玄，真是談何容易！

⑧第七册第六一八頁更懸牛頭賣馬脯條記：「丁郡……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引文見後漢書卷二十六百官志注。辭典誤「收」為「牧」字，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同册第八七七頁「王淑妃號茂見差」，「茂」是「花」字之誤。同頁王樹常條，顧維鈞的「鈞」誤作「鈞」。同册第八六四頁「王圓照」是王照圓之誤，事見清史稿卷五一三，及清代閩閣詩人徵略卷七。同册第二三〇頁「漢書不始史記」，「始」是「如」字之誤，標題錯了，日文說明還不錯。同册第二三五頁漢隱帝條用日文說明：「郭允明等ヲ信用シ廣諸大臣ヲ殺シタガ郭威反シ，允明事ヲ知メナ成ラズ，帝ヲ殺シ，自殺シ，國亡ブ。」這在舊五代史卷一百〇三隱帝紀原文是：「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于帝而崩，蘇逢吉郭允明皆自殺。」這想是把「知」誤看作「治」，於是就照「治」字翻日文。「知事不濟」是知道事無可為，「治事不成」是辦事不好，意思是很不相同的。

⑨第九册第二八八頁胡適條：「民國積（績之誤）溪人，胡培翬之子。」第二九八頁胡培翬條，下注參考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八，清史列傳卷六十九，續碑傳集卷七十二。讀這些書的任何一種，可以知道胡培翬是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卒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胡適生光緒十七（一八九一年），如何能有父子關係呢，胡適和胡培翬在辭典裏相離不過十頁，胡培翬傳明記為嘉慶進士，胡適為民國人，民國人如何能有嘉慶年間中進士的父親呢？這種地方一看就可以發現錯誤，編者竟校多少次不能改正，不能不懷疑編者的年代學素養了。

⑩第七册第一一六八頁病已條注「漢宣帝初名。」第二册第三二五頁劉詢條注云：「初各病已。」從字形和注音看，兩處都誤「已」為「己」。漢書宣帝紀：「孝武皇帝曾孫病已。顏師古注「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更改諱詢。」「病已」是要病好，「病己」是自己永遠患病，豈有如此命名之理。讀漢書不細看顏師古注，未免太疏忽了。

⑪第五册第五十二頁戴笠條記有兩個戴笠，字耘野的吳江人和杭州人戴曼公為二人，到五十四頁記戴曼公，又據先哲叢談續編的錯誤記述，把二人混合為一。又把戴曼公東渡日本

當和尚行醫的事全刪去，把吳江戴耘野所著的書全寫到杭州戴曼公的名下。兩人的不同行誼不同著書，請參看拙著明季兩戴笠事蹟考（收入文史叢論中，民國五十年東海大學出版）。

⑫有關的各條互注備查，可以避重複，取連繫，本來是很好的體例，但作的並不徹底。例如第十一冊第七〇三頁僅引了月令廣義三教搜神大全，以秦瓊，敬德為門神、並沒有注山海經論衡風俗通義等較古的書以神荼鬱壘為門神，也不附注參看神荼鬱壘條。第十二冊第六六八頁鬱壘條和第八冊第四五七頁神荼條，所引資料，幾乎全部重複，鬱壘條注了參照神荼條，神荼條沒有注參照鬱壘條，神荼鬱壘兩條都沒有注參看門神條。於是乎這關於門神的三條是各自孤立編成，沒有取得連繫，用的人也就不能有一查全得，脈繫枝連，源源本本之感。

⑬本書着重圖像，是是很好的設計，蒐羅印入圖像兩千八百幅，也很難得，只是選擇的不夠精。例如大量採用明朝王圻的三才圖繪。王圻的書有一百六卷之多，原刊於明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七），清人修四庫全書，列入類書存目，提要說：「務廣貪多，冗雜特甚。其人物一門，繪畫古來名人形像，某甲某乙，宛如目睹，殊非徵信之道，如據蒼頡四目之說，即畫一面有四目之人，尤近兒戲。」（註九）王圻書的人物像，既缺乏歷史的真實，也沒有什麼藝術的價值，只在研究木板畫印刷史上有作用。如第二冊所收的劉秀（漢光武帝）像劉義隆（宋文帝）像都與歷史上所記載的全不符合。第一冊二四四頁所收不死國人像，更是荒誕無稽，全無意義了。北平故宮博物院以前出版的故宮週刊印出故宮南薰殿所藏的歷代帝王畫像歷代名臣畫像不少，這都是比較有根據的，技巧也遠比三才圖繪高明。此外如番禺葉恭綽氏所印的清代學者像傳四冊，也屬採訪真確，畫法工緻。這些像都不曾為編者所注意。發明照像以後的照片，編者也不注意蒐求。例如第五冊姓曾的古今許多人，只收了三才圖繪的一幅曾參像，曾國藩那樣大人物連照片也沒有。像第一冊第五十三頁的丁香圖，也採自三才圖繪，任何人都不能想像這是丁香。我們很詫異，編者為什麼不採用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註十）。

⑭第二冊第五七四頁，南元條用日文解釋說：「明清時代的科舉考試，南方各省應京試時，除第一等歸北方直隸人外，第二等合格之南方人名為南元。」這簡直不知道說的是什麼。查辭海第二一七頁南元的解釋說：「明清科舉時代，南省人應試北闈鄉舉者，其中試第二名謂之南元，蓋第一名例屬直隸本籍人也。清稗類鈔考試類，乾隆辛卯高宗以解元文不甚佳，移第三，以南元為第一。奏事太監曹某奏稱。順天鄉榜向以順天人置第一，乃易還之。」本條語意不明的原因自然由於過求簡化，然而簡到莫知所云，就不如根本不收。第一二名改成第一二等，連「元」字的解釋也沒弄明白。漏掉「鄉試」，可以使人想會試也有南元。這種錯誤的簡化，是要不得的。

⑮第四冊第八五〇頁徐渭一條，參考書僅注明史卷八十八，徐文長的著作却列舉了二十一種之多，可見是從多方面蒐集而來，用功似乎不少。查徐渭的著作，明史本傳沒有提到，藝文志著錄三書，分在子集兩部。四庫書目著錄五種，均在存目，明陶望齡作徐文長傳，提到名字的有九種書。大辭典的編者務求博聞，不加細考，就錯誤叢出了。「抄代集」、「抄小集」、「闕篇」都不過是徐文長集編輯過程中一種名稱，已經包括在現行徐文長集中。桃櫻館集今無其書，多收入徐文長逸稿中。「玄抄類摘」從序文看是摘錄古人論書法的文字，似未成書。「雲合奇蹤」是小說，「歌代嘯」（辭典誤作歌嘯臺）是劇本，均屬他人依託，並非徐渭所作。「路史」是一種雜記冊，無甚價值，四庫書目提要評論過，辭典列為文長著作的第一種，大概望名定品，當作史書看了，四庫書目把這書列子部雜家存目五，明史藝文志歸入子部小

說類。還好，孫一觀依託徐渭作的天池集沒有收入，總算慎重。徐渭一條，只有十一行文字，說些什麼，不說什麼，真應當大費斟酌了。要深入才能淺出，要博考才能鑄裁，談到這裏，以一個人的力量，編這樣大書，自始是一件難事了。

⑮第八冊第九十六頁皮錫瑞條云：「民國善化人……歷任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習，後歸著書以終。」查皮錫瑞生於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二月初四日，不能說是民國人。他因為參與湖南的戊戌新政，光緒二十五年被革去舉人，交地方官管束，時年五十歲，從此沒有出過湘省。庚子以後，從光緒二十九年到三十二年京師大學堂屢次邀請他去教經史等科目，但他始終未曾應聘。並不是教了京師大學才回去著書。事詳見他的孫子皮名振所編的皮鹿門年譜（民國二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⑯本書文字敘述方面，也似乎有機械鈔錄多，匠心剪裁少的毛病。例如第七冊第一一三六頁畿輔叢書條，沒有敘明這叢書的總卷數、選刻經過，出版年月，只說王灝刊鄉里先賢書，而王灝的里貫又不詳，連為他選校的錢恂、黃國瑾、王樹枏、胡景桂等都沒有提到，却全鈔了叢書子目了事。

⑰本書雖然編了三十多年，總合看，似乎橫的發展多，就是詞彙條目越來越多。縱的發展少，一條編成，僅據極少的資料，不再補充修正，如第十二冊第九六〇頁黃興條，第二冊第八九八頁吳祿貞條，都是內容非常貧乏，編者不是找不到更多資料，而是不再尋求，滿足於極簡陋的說明（註十一）。

⑱本書雖有不少條是鈔康熙字典辭源辭海等書，但亦有很多條比那些書進步多了，不僅以收字多辭彙多制勝。例如第十二冊第八四頁鵲橋條云：

李白擬古詩，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白孔六帖鵲部，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歲華紀麗七夕鵲橋已成，織女將渡，注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何景明詩，鵲橋崔嵬河宛轉，織女牽牛夜相見。

這是從類書鈔出、六帖所引的淮南子，今本無其文，俞正燮疑為出於淮南萬畢術（見癸巳存稿卷十一七夕考），韓鄂歲華紀麗所引的風俗通，今本也無其文，錢大昕纂風俗通義逸文收入。可是無論如何，這故事的最早出處，大體知道了。辭源的鵲橋條說：「風俗記，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為梁以渡織女故也。」詞海則說：「風俗記，七夕織女當渡河，使鵲為橋，何景明詩，鵲橋崔嵬河宛轉，織女牽牛夜相見。」這所引的風俗記，不知道是何時何人的書，大約是風俗通的誤寫。辭源的說明，那幾句是引文，那幾句是編者案，也不分明。兩相比較，大漢和辭典是充實周密多了，又如第十二冊第一一五頁「龍行虎步」一條，引宋書武帝紀、陳書高祖紀，雖然沒引南史梁本紀和虬髯客傳，比辭海之以宋史太祖紀為據，要翔實多了。

⑲本書有些條目，確實表現出融會古今，綜合中日，原原本本的匠心，現在試把第三冊第八一八頁「字書」一條的日文解釋，譯成中文如下：

「字書」，收集漢字，表示字音，說明意義的書，也叫字引。在中國歷代史志裏，和訓詁韻學統稱小學，並無字書之名。清紀昀於四庫書目小學中，分訓詁、字書、韻書三類。訓詁的字書，以字義為主，屬於此類的有爾雅、漢孔鮒的小爾雅，史游的急就篇，揚雄的方言，劉熙的釋名，魏張揖的廣雅，宋陸佃的埤雅，明朱謀瑋的駢雅等。音韻的字書以聲音為主，屬於這一類的有隋李登的聲類，呂靜的韻集，陸法言的切韻，梁沈約的

四聲譜，唐孫愐唐韻，句中正的廣韻（以上亡佚）宋陳彭年的大宋重修廣韻，丁度等的集韻和禮部韻略，毛晃父子的增韻，劉淵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吳棫的韻補，金韓道昭的五音集韻，元黃公紹的古今韻會，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明洪武中樂韶鳳等的洪武正韻，凌稚隆的五車韻瑞，清邵長衡的古今韻略，聖祖勅撰的佩文韻府，顧炎武的唐韻正等書。字形的字書，以文字的形體為主。屬於這一類的有周宣王太史的史籀篇，秦李斯的倉頡篇，趙高的爰歷篇，胡毋敬的博學篇，漢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揚雄的訓纂，後漢賈鮪的滂喜篇，（以上亡佚，殘文見玉函山房輯佚書），許慎的說文解字，梁顧野王的玉篇，唐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張參的五經文字，元度的九經文字，宋郭忠恕的汗簡和佩觿，洪适的隸續，婁機漢隸字源和班馬字類，遼行均的龍龕手鑑，明魏枚的六書精益，梅膺祚的字彙，吳任臣的字彙補，張自烈的正字通，清聖祖勅撰的康熙字典等。上列的書，字彙始以筆畫順序排列，康熙字典集其大成。仍多錯誤，王引之因著字典考證。談到日本字書的沿革，平安朝初期，空海始作篆隸萬象名義。昌泰年間，僧昌住作新撰字鏡。這都是以字形分類的。源順的和名類聚鈔，為分類體，各部門下，列事物漢名，加注和訓。類聚名義抄體裁如玉篇，以片假名附訓讀，多收二字以上熟語。到橘忠兼的色葉字類抄，才用依訓讀查漢字的體裁，分伊呂波四十七部。下入鎌倉時代，有字鏡集倭玉篇等書出，音訓皆用假名，最為通俗。至於平仄字書，有平他字類抄，入室町時代有新韻集。室町時代的分類體字書有下學集、撮壤集、類集文字抄。節用集、溫故知新書等。其中溫故知新書是用五十音圖次序查，算最早用五十音查的書。只有運步色葉集是單用伊呂波分的。到了江戶時代，倭玉篇屢次重刻。宋代改修的大廣益玉篇，也加以音訓翻刻。梅膺祚的字彙不久傳來，施以標注，以假名附音翻刻。以後把康熙字典附以音訓印行。關於韻書，聚分韻略自前代流行。作有洪武聚分韻、伊呂波韻等。收集漢語，分類加以解釋，有林道春的多識篇，貝原好古的倭爾雅，伊藤東涯的名物六帖等。到明治時期，以康熙字典為基礎，加以國字，注音訓意義，列舉熟語之書叢出。此等書均依筆劃檢查，以後依字音按五十音序排列的書多起來。參看辭書（10—38671—56）類書（12—43636—41）條。魏書江式傳，式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四庫提要、經，小學類二，字書之屬三十六部，四百八十卷，皆文淵閣著錄。」康熙字典凡例，正字通所載諸字，多有未盡，今備采字書韻書經史子集，來歷典確者，並行編入。

這一條很得要領，他使我們理解日本字書沿革，當得起深入淺出，舉重若輕的手法了。

②大要因為諸橋先生病眼的原因吧，本書的校對很不理想，例如第二冊第三二四頁劉秀條。廟號世相，「相」是祖之談。又如第三冊第八一八頁第一欄陸方言是陸法言之誤，第九四一頁，末行松雲是「松雪」之誤，同冊第九四四頁二欄一行，「晁輔之」是「晁補之」之誤。第四冊第六六二頁曹植鎮銘，「鎮」為「鏡」之誤。第五冊第九八三頁，曹丕崩年五十，「五十」是「四十」之誤。第六冊第九〇五頁求備條引論語陽貨：「無求備於一人」，陽貨是微子之誤。第七冊第八二四頁王圻書室名桃花源，桃花是「梅花」之誤。第十冊第五六七頁，謝道韞是王凝之之女，「女」是「妻」之誤，第十二冊第九六一頁，黃佐是「嘉佑進士」，嘉佑當為嘉靖之誤，這一錯就把黃佐從明世宗年間，提早到宋仁宗年間了。把本書隨便一翻，常能發現筆誤或排印錯誤。辭書是給一般人看的。能一看訂正誤字的人，像邢子才、顧千里一流人，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據我看，本書的校對水準很低，就是誤字率之高，遠在康熙字

典、辭源、辭海等書之上。最後的校正，才是真正發揮了主編的權，如果把這種權，分一部分給排字工人，隨手亂擺，無論編的多麼好的書，都要大大減色了。（第六冊第九三二頁第三欄江部出現「江繡鞋」一條，看日文注解，說是以燒紅的鐵鞋着足，應當是酷刑「紅繡鞋」之誤。「紅」「江」字形類似，而日本的讀音又同，卡片誤書「紅」爲「江」，本條遂由紅部誤編入江部，這又是一種錯誤的離奇特例。）

②本書對於中國學人最有用處的地方，是廣泛收入了日本漢學家的傳記著作目錄，把這些資料彙集起來，就成爲一部日本漢學史。例如關於十三經四書，日本學者作了些什麼書，物茂卿、林羅山、江村北海、安積覺、賴山陽，等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著作？日本書記，大日本史，日本外史，本朝通鑑等漢文著作是什麼內容？在本辭典裏，都得到正確詳密的回答。在溝通中國國學和日本漢學常識上本書是有其重大貢獻的（註十二）。

③本書雖然以收辭彙多，包羅豐富見稱，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的毛病，仍然不免。例如第三冊「國」字下，「國術」「國劇」「國畫」等詞都沒有出現。國歌條沒有提到中國現在的國歌，也沒有提到民國二年到十六年流行的卿雲歌，「國文」一條沒有提到中學科目之一的國文科。稍微專門一點的詞，如第四冊廣部沒有「廣倉學叢書」，第六冊江部沒有「江有誥」，十二冊音部也沒有江有誥的「音學十書」，詩人的名句却收入不少。受傳統類書詩韻一流書的影響，相當深刻。現代學術詞應用通俗詞却常有漏略，不能不說是缺點。

六 修訂的途徑

清人的康熙字典是官修的，纂修的翰林蔣廷錫、朱啓昆等有二十七人之多，歷五年成書。以後王引之作字典考證十二卷，改正訛誤達二千五百多條（註十三）。明治年間日本渡邊溫（知新）印訂正本康熙字典，宣稱考異一千九百三十，訂誤四千。（註十四）近年臺北嚴一萍先生的校正本則謂「較之殿版，凡改正訛誤一萬二千餘條。自有康熙字典以來，當以此本爲最完善。」可見這種包羅宏富的工具書，欲求盡善盡美，不是單人匹馬，一蹴可及。諸橋先生的書範圍大於康熙字典若干倍，以一人的力量主編，智者千慮，不能沒有疏失，也是理所當然，事所必至的事。談到本書的修訂，我以爲不僅是諸橋博士一人的責任，也難期望由這位老教授的餘力，採納各種建議，作到圓滿成功。最好由老博士授權給研討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化機構，邀集兩國通人，分門別類校閱。有些訛誤的發現訂補，中國學者也許遠比日本學者爲容易，可是原書的說明主用日文，不懂日文的中國學者，也就難於效力了。民國四十九年大辭典剛出版的時候，我曾寫一短評，刊於是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副刊，正湊巧那天是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在東京贈予諸橋博士獎狀的一天。另外我的大度山日記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亦主要評閱本書，因鈔出發表於文星雜誌六卷六期（四十九年十月號），我本想爲此書作一番通盤的校勘，但是個人所業繁多，時間和精力，都不允許。也想到康熙字典流行遍天下，知道王引之的字典考證的却很寥寥。這並不稀奇。查工具書是爲了省事，看支離破碎的訂誤書，却是最爲費事。讀十三經的人，絕少讀到阮元的校勘記。一般書的勘誤表，也常無任何作用。因而也就放棄了這種費事無作用的工作。大漢和辭典出書過了九年，在中文日文雜誌裏，也始終看不見有力量的訂正性的評論文。我的一部分叢殘札記塵封了許久。現在摘錄一部分發表，連帶詳細介紹本書的作者、內容和優點，作爲中國翻印本書，我使用本書的酬謝。本來想找一個流行較廣的雜誌登載，可是我如不能細心自校，這篇訂誤的文章，也許還

需要勘誤，就等於白作了。斟酌再三，還是發表於本刊，我將加印抽印本若干份贈給中外使用本書的朋友們，以彌補學報發行力的不足。最後我再度鄭重向本書的編輯者和印行者致深摯的謝意。

- (註一) 民國四十九年臺北市文星書局發售大漢和辭典預約廣告。當時定價每部為新臺幣二千六百元，預約實售僅一千八百元。
- (註二) 根據大漢和辭典全卷出版完結紀念預約日文說明書，一九六四年東京大修館書店印行。
- (註三) 以上所引各種評論文字，均見註二。
- (註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六集部詩文評類二著錄止於鄭方坤的全閩詩話。鄭係雍正元年進士，卷一九七詩文評類存目止於杭世駿的榕城詩話，杭世駿卒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長袁枚二十歲。
- (註五) 潘耒為潘耒章之弟，顧炎武弟子。遂初堂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五卷，集外詩文稿二卷，乙亥叢編本。秋室集十卷，楊鳳苞著，湖州叢書本，又秋室遺文一卷，范白舫刊本。
- (註六) 民國五十四年九月臺北藝文印書館印四庫提要辨證卷十四，第八二七頁，雜家類一劉子。
- (註七) 物徂徠即荻生徂徠，字茂卿，江戶儒學者（一六六六——一七二八）師法明七子李攀龍、王世貞等，倡古辭章學，開日本護國學派，著有辯道、論語微、太平策等書。重野成高名安釋，鹿兒島人（一八二七——一九一〇）明治時代漢學者，法桐城派古文，與黎庶昌交遊，著有成齋文集，以古文史學知名。
- (註八)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附書名人名通檢，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
- (註九)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八子部類存目二，有明萬曆己酉（三十七年）原刊本，附圖。
- (註十) 植物名實圖考三十八卷，長篇二十二卷，清吳其濬撰，道光二十八年蒙自陸應穀刊；民國八年山西官書局補修重印本，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附索引本。日本有重修植物名實圖考三十二卷，小野職懋重修，岡松辰點，明治十六至二十年鉛印本，見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一八八頁子部農家類。
- (註十一) 吳祿貞的重要性是因為宣統三年九月，他以清朝政府任命的第六鎮統制山西巡撫，在石家莊響應了革命，和山西革命軍的都督閻錫山聯合，要截斷京漢線，並逼清朝政府停戰言和，吳雖被載濤派人刺殺，第一鎮旗兵由石家莊北潰，彈械軍餉盡為晉革命軍所奪，山西獨立形勢遂以大定，與清廷退位大有關係。此為辛亥革命史上有名事實。辭典記吳事僅至由德法二國歸，任第六鎮統制，駐保定為止。吳的記述，止於辛亥革命以前，就全無意義，不知為何收此人。黃克強的記述到民國元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的陸軍總長為止。克強先生卒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書連民國二年他的領導二次革命反袁也沒有涉及到。這使我們懷疑這兩條的卡片，吳成於清末，黃止於民元，以後不會再補充。
- (註十二) 日本漢學是中國學術史的一個分支。中國到現在沒有一部源源本本，翔實可讀的日本漢學史是一種憾事。
- (註十三) 字典校字錄。高郵王引之撰，清道光七年刊巾箱本，字典考證，王引之撰，道光十一年刊以地支等字編次。
- (註十四) 康熙字典在日本流行者為安永九年（清乾隆四十五年西元一七八〇）都賀庭鐘等附字典琢屑，字典初學索引本。渡邊溫訂正本，明治二十年（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以銅版印行。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一月臺北藝文印書館有影印本。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校完於大度山

評諸橋博士主編大漢和辭典提要

梁 容 若

日本諸橋轍次博士所編大漢和辭典，共計十三冊，一萬四千餘頁，歷時三十七年，助手達九十人，稱爲溝通中日文化的重要工具書，臺灣有翻印本，極爲流行，本文共分六段：

- 一、諸橋博士的生平、學術成就，其他著作介紹。
- 二、大漢和辭典編印經過。
- 三、大漢和辭典的編輯方針與體例。
- 四、日本學術界文化界對辭典的批評。
- 五、對於大辭典的意見：指出辭典最成功卓越的地方，訂正各種訛誤約六十餘處。
- 六、建議修訂大辭典方法。

二

本文爲作者整理九年來閱讀大漢和辭典之筆記，歸納濃縮而成，作者過去對於大漢和辭典之短評數篇，亦鎔裁在內，爲作者對辭典的總合代表意見。

A Critique of Morohashi Tetsuji's Great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 summary of Professor Liang Jung-jo's article

The *Great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edted by Japan's Morohashi Tetsuji, 13 volumes, over 14,000 pages, took thirty-seven years to complete, and required some ninety editorial assistants. It is considered a major tool for bridging the cultures of China and Japan. It has been reprinted in Taiwan, and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The present critique is in six parts:

1. A sketch of Morohashi Tetsuji's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his other works.
2. The editing and printing of the *Great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3. The editorial methods and form of the *Great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4. Criticism of the *Great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in Japanese academic and cultural circles.
5. Some comments on the *Dictionary*; its most successful and outstanding points; correction of over sixty inaccuracies.
6. Suggestions of ways to revise the *Dictionary*.

The present article is the condensed version of the condensed version of the notes of nine years' use of the *Dictionary*. It also contains several of the author's previously published short critical reviews of the *Great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and represents the author's general views of the work.